北京大学
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简　报

2007 年第 1 期（总第 11 期）　　2007 年 1 月 18 日

主　题：

-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大学的人文建设

关键词：

- 自由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人文教育，教育经济学

摘　要：

人文教育延承自由教育（普通教育）的本质，具有保存高雅文化的职能和较强的自我报偿、不受社会后果约束的价值取向。随着大学与知识日益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大学在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应维持以人文教育为核心载体的理想主义和学术传统。本文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大学人文建设的三个核心问题，即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大学财政与人文精神的建设、学术市场和大学治理，以期为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建议。

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大学的人文建设

王 蓉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一、概念界定

在西方文化中，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普通教育的前身是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其中的“自由”二字有着不同于今日的特殊含义。与个人在社会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相关，自由教育就是适合于与奴隶、工匠相对的自由人的教育，与当时的身心二元化的社会分工相适应，是属于上层社会的特权（布鲁贝克，2004 年，第 82 页）。这决定了自由教育的主要特点。如亚里士多德所言，经济安逸是学习自由学科的一个重要前提。置身其中的人有着优裕的生活基础，不感到生活的压力。其次，自由教育价值就在自身，不受后果约束，自我报偿。与之相反，那种寻求外在报酬的与自由教育相对的职业教育被看成是低地位而受到强烈蔑视（布鲁贝克，2004 年，第 87 页）。自由教育作为整体与社会生活相对隔绝，其合法性不是通过与社会生活相联系而确立。从事自由教育的人不是为了求生活而去找知识，促成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

这种自由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随着工业化革命的到来而崩溃。人人成为自由的公民，而人人参加工作的社会逐步形成。人们开始认为，既然自由教育是适合于自由公民的教育，而全体公民又都是自由的，那么人人都应该接受自由教育。由于这样的民主意识，一些学者打出

了“普通教育”的旗号，认为古老的自由教育一词有着传统和保守的、带有阶级意识的痕迹，其内容具有上层社会的偏好，因此必须加以改变（布鲁贝克，2004 年，94 页）。

除了普通教育——职业教育这一相对应的概念外，人们又经常用另一组概念表述大学课程和学科的分类，即人文教育（humanities）与非人文教育。人文教育是面向所有学生的、“所有自由人”的普通教育的基础。如布鲁贝克（2004 年，第 94 页）所言：“一个人要能完全胜任工作并充分享受工作的快乐，就应该懂得工作的社会学的、历史学的、心理学的、文学的基础艺术的各个方面。”然而，这种依托教学和普通教育功能对人文教育的表述是片面的。作为大学教育的传统核心和精神代表，人文教育延承着自由教育的根本特性，即有着保存高雅文化的职能和较强的自我报偿、不受社会后果约束的价值取向。

人类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大学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困境也日渐广泛化（李维武，2000）。随着大学与知识日益获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地位，学校要为现代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学校如何在外部主导力量的影响下、在服务于日益多元化的功能的同时，维持以人文教育为核心载体的理想主义和学术传统，这是目前高等教育发展最为突出的问题。人文建设的任务并不止于中国的大学之中，然而中国大学的特性却使得这一任务面临着更加巨大的挑战。

二、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有助于理解大学人文建设的三个核心问题：1．在一国教育系统中，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地位受何种因素影响？2．如果大学的职能是让教师们从事不追求外在报偿的学术活动，那么谁应该为这些活动提供资金的支持？这也就是大学财政的问题。3．那些承担着人文建设的个人——人文学科的大学教师——从哪里来？如何为他们提供激励机制？这与学术市场（academic labor market）和大学内部的治理问题密切相关。

（一）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

首先，实证研究表明：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在一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Bertocchi 和 Spagat（2004）提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型，并证实教育体系中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学生比例（V/G）与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 GDP 衡量）的关系呈现倒 U 型。在早期发展阶段，普通教育（自由教育）仅是局限在社会富裕和精英阶层的教育，形成普通教育（自由教育）——职业教育的分类是教育分层的集中体现。随着工业化和技术的进步，资本对于受过技能训练的劳动工人的需求增长，普通大众对于教育机会的需求同时也在增长。但是，普通教育仍然受到精英阶层的把持，非精英阶层只有职业教育这种选择，职业教育在此背景下快速扩展。然而，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发展，职业教育的比例下降而普通教育的比例上升。根据这一研究，意大利 V/G 比例在 1861 年是 1.05，1921 年是达到 3.06 的顶点，1990 年又下降到 0.71。这

些研究者使用 UNESCO 提供的 149 个国家 1950-1991 年的中等教育数据分析发现，根据回归分析，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学生比例（V/G）在人均 GDP 为 7310 美元时达到顶点。我国当前的人均 GDP 仅在 1000 美元左右，因此这种倒 U 型理论的政策含义就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我国仍有着巨大的潜力。

当前，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对于普通教育发展的最强劲支持也来自相关的教育和经济增长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背景之下，关于普通教育优势的分析越来越多。Krueger 和 Kumar（2002）的研究指出，欧洲和美国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表现与其教育系统中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导向密切相关。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在其中等和高等教育中，更加偏重与特殊技能培养挂钩的职业教育。这导致欧洲的劳动者在技术迅速变化的背景下，缺乏新技术采纳的能力，从而最终导致 1980 年以后欧洲的经济增长落后于美国。

除了经济增长贡献的观点，教育经济学中对于为何应支持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发展多是从教育的个人投资行为角度来分析的，这与人文精神的独立、不求外部报偿、追求自我价值的核心特性相悖。然而，在实用主义哲学占主导的今天，这样的分析和行动逻辑却从根本上决定着大学的发展方向。正如著名的教育家克拉克·克尔（2001，第 218-219 页）曾经就美国大学的问题指出，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职能（为劳动力市场的训练和以资助为基础的科研）正在压倒高等教育的自主职能（保存高雅文化和应答个人好奇的学问）。

在全球范围内，人文学科的发展受到教育需求市场的严重影响。

换句话说，人文学科的教育个人收益率通常较低，就业形势不如其他学科。一个对于美国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研究表明，虽然这些院校的宗旨、声明都强调其自由教育的使命，但是专业性课程在教学中却普遍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而这是一种教育需求驱动下产生的变革（Delucci，1997）。

在我国，高等教育同样受到越来越强的市场压力，1999 年后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大。这一快速发展虽然表现为政府政策驱动，但是有着教育需求的背景。我国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获得更多教育对个人未来的社会经济福利至关重要，而这一现象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走向成熟的标志。许多研究都发现，我国的教育收益率一直在提高。例如，根据若干年的城市入户调查数据，陈晓宇（2003）发现本科及以上教育的明瑟收益率[1]从 1991 年的 4%提高到了 2000 年的 13%。

在这种政府主导、学校受到强烈的计划指令控制的扩招中，人文学科的教育规模并没有遭到严重的负面影响。根据 1995–2003 年全国本专科生分学科在校生数的分析，人文历史学科的学生比例在这一期间从 14%升高到 16%，相对规模保持基本不变。与此同时，经济管理学科和法学学科的学生比例大幅上升，工学的学生比例则大幅下降。实际上，由于人文学科成本较低，依靠人文学科的扩展来达到总体规模扩展的目标是一种便宜的选择。

但是，人文学科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瞿振元、谢维和等（2001，第 33 页）对 2000 年–2002 年中央部委直属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的分

[1] 简单来说，明瑟收益率就是在考虑了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每多接受一年教育给个人带来的平均收入的增长。

析表明，理工科毕业生就业形势比较好，而人文社会科学毕业生就业相对困难。而在人文学科中，“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需求和供给”现象也十分突出，较高比例的毕业生最后任职于高等学校和其他教学单位，或者继续研究生学习。

（二）大学财政与人文精神的建设

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谁应该为大学提供资金，包括大学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人文教育和非人文教育，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决策依据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则：谁受益，谁付费。由于教育中存在着社会收益，仅仅依靠个人财政和市场供给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应使用公共资源进行干预。

这种分析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所应受到的不同对待。转引 Mingat 和 Tan（1996，第 6 页）的阐述，“正如舒尔茨(1988)指出的那样，‘……很少有研究赋予了教育的外部性以货币化价值……’。估计的不完全性使得一些观察者不由地怀疑人们在规划公共政策时借用这些经验证据的合理性，尤其当公共政策涉及到如何在各级教育中分配政府公共开支的问题时，能否从这些经验数据中寻找依据更值得质疑。Psacharopoulos(1996)指出，尽管高等教育中的科研活动会产生很大的外部性，但是科研真正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相反，那些没有进过学校的人终身都是文盲的可能性‘接近于1’。基于这样的比较，Psacharopoulos 认为，即使缺乏对教育外部性的精确衡量，将教育投资的重点放在初等教育上仍然是对社会有效的，这对保证初等教育的普及，对保证足够人群接受这个层次的教育

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种大的政策背景下，人们还没有对如何对不同大学学科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展开讨论。实际上，在福利经济学中，人们常常使用“功德物品”（merit goods）的理论阐述政府支持艺术的合理性。“功德物品”概念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色彩，指的是那些“即使社会成员不想要但也应该提供的物品”（罗森，2000 年，第 44 页）。这一概念的应用性虽然还没有得到充分探讨，但是却为人文教育和普通教育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持指出了一条出路。

（三）学术市场与大学治理

在全球视野下，高等教育财政紧缺以及大学人文建设受到强烈的教育需求和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现象并不是唯中国独有。但是，正如孔子所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对于从事人文教育的学者，实现人文精神的目标，应是由其自己的力量，并不是靠外部的力量。实际上，将学术力量作为支撑人文建设的中流砥柱、作为与行政和市场力量的抗衡，是全球视野下高等教育的普遍经验。大学教师作为学术力量的载体，其供给和需求、其行为和自我价值，都值得深入研究。

教师的供给与需求是教育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大学人文建设的核心在于，成为大学教师的这些人的自身职业偏好是否与人文精神吻合，这样的教师供给是否充足，以及如何设计大学中的制度以建设合适的激励环境。以发达国家为背景的研究取得较为一致发现，即：第一，大学教师的工资相对于其同等学历、占据其他劳动力市场位置的人的报酬是较低的。第二，大学教师是“自我选择”的一群，其群

体特点最为突出的就是强调工作的内在价值和自主性，较不看重工作的货币报酬。这些特点也和成为大学教师本人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关。

对于大学中的激励机制，经济学的分析表明，必须采取一个均衡和中度的激励体系。高等教育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多委托人的服务。在其不同的目标中，各个目标具有不同的外部报偿——市场回报性和可测量性。相对而言，人文教育的目标具有较弱的外部报偿——市场回报性、较弱的可测量性。如果过分强调高等教育的市场回报和可测量目标，将对人文教育、以及高等教育中那些软目标的达成产生负面的影响。

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我国高等教育中的一些实践和政策正在损害人文精神的建设。首先是教育财政的因素。由于资源短缺，高等学校的创收压力层层分散到下属的学术单位和个人，导致创收激励在整个机构中向下、向各个学科渗透。各个学科的教师待遇与工作条件与创收活动密切相关，这种隐性和显性的压力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其次，高等学校内部的资源分配过于分散化，其领导机构的资源统筹能力低下，造成教育的市场回报性压力涓滴到大学中的个人，使人文教育没有“缓冲器”的保护。根据阎凤桥的研究（2005），通过比较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后发现，如果国家对于大学系统采取集中管理方式、大学具有较小办学自主性的话，则大学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应变能力较弱；反之，当大学可以自主办学时，则大学会加强自身战略规划和协调能力建设。我国大学对内的领导和调节能力的问题与大学对外的缺乏自主性密不可分。

最后，当前普遍采取的高等教育质量监管机制偏重可测量性和市场回报性指标，从根本的政策层面上就扭曲了人文教育的价值取向。这种整个系统追求量化和外部效应的监管制度与大学内部的对于教师个人的激励机制互相呼应，可能进一步导致我国学术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

三、政策建议

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路重而道远。当前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发展战略应该说为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大学人文精神的建设与中国教育的整体发展与改革密不可分，人文教育的学者应该参与讨论和分析如何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中国教育。

其他的建议包括:

第一，深入探讨与研究人文教育作为“功德物品”的特性，以及其作为学科群体得到特别的财政和社会支持的合理性。

第二，探讨适应于人文学科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特别是在当前的高等教育治理环境下考虑人文学科特点制定相应的制度。

第三，注重人文学科的后备力量建设。努力选择与培养那些切实将人文精神与自我价值结合的适合者。

参考文献:

[1] 陈晓宇,陈良　,夏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变化与启示.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电子期刊),2003(2)

[2] 哈维·S·罗森.财政学.平新乔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44

[3] 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18~219

[4] 李维武.大学人文教育的失落与复兴.高等教育研究,2000(3)

[5] Mingat, Alain and Jee-Peng Tan.教育的社会受益率:基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估计.刘钧燕译.1996.6[未出版]

[6] 瞿振元,谢维和,陈曦.2000-2002年中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形势的分析与预测.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33

[7] 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82,87,94

[8] 阎凤桥.学术劳动力市场的特性与研究型大学的教师聘用制度.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电子期刊),2005(3)

[9] 岳昌君,文东茅,丁小浩.从求职和起薪看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基于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期刊),2004(2)

[10]Bertocchi, Graziella, Michael Spagat 2004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Educational Systems: Technical v.s. General Education, Distributional Conflict,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73: 2. Elsevier Science

[11]Krueger, Dirk, Krishna B. Kumar 2003 Skill-Specific Rather Than General Education: A Reason for Slow European Growth? *The FBE Working Paper Series* No.02-7. 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12]Delucchi, Michael 1997 'Liberal Arts' Colleges and the Myth of Uniquenes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68: 4.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Columbus

[13]Psacharopoulos, George 1996 Public Spending on 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oo Much Rather Than Too Little.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5:4. Elsevier Science

上期回顾

- 2006 年第 7 期（总第 10 期）

  重庆化解“普九”债务　促进教育发展

  摘要：重庆市从“普九”欠债清理核实工作入手，通过明确各级政府分担责任、有效利用上级转移支付资金和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债务“销号制”和“直接支付制”等措施逐步实施“普九”债务偿还计划，确保基础教育稳步、健康发展。

- 2006 年第 6 期（总第 9 期）

  中日高等教育财政高层研讨会

- 2006 年第 5 期（总第 8 期）

  “全国高师院校财务管理研讨会”2006 年年会综述

特别感谢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邓睿总会计师提供简报 2006 年第 7 期稿件

稿件来源：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本期印发：1200 份

相关新闻和资料下载网址：http://ciefr.pku.edu.cn

注：文中引用观点未经本人审校，不代表本所观点。简报内容仅供参考，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所同意，并注明“转载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简报”字样。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电子信箱：**ciefr@pku.edu.cn

责任编辑：郭 楠　　**编辑：**郑 莉　周 娟　　**电　　话：**010-5887-6616

地　　址：北京市 8762 信箱，燕园资源大厦 612 室（100080）　**传　　真：**010-5887-6169